

瞿冕良

本家合校...
字錄...
錯...
...
...
...

版刻質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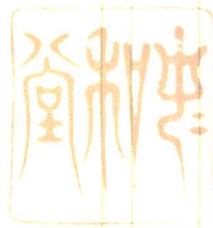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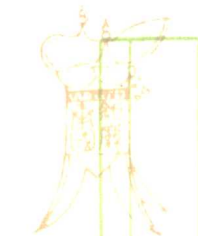
相臺岳氏刻
梓荆谿家塾

世錦夏氏
仲聯題



雖正柴五十四開
雖于廣陵殷其齋

齊魯書社



瞿冕良

版刻質疑

齊魯書社

版 刻 质 疑

瞿 冕 良 著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4.5 印张 2 插页 78 千字

1987 年 3 月第 1 版 198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,000

书号 11206·134 定价 1.15 元

许 序

瞿君冕良于江苏师范学院①从事图书馆工作逾二十年矣。余于1957年至苏州市图书馆工作，于馆际交往中，识其面而未稔其人。1978年秉周恩来总理之遗命，汇编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，我市成立协作小组，余总其事，瞿君冕良参与是役，于是过从渐密。瞿君拙于辞令，然论及版本鉴定，疑义与析，瞿君之言，每甚精当，固知其潜心古籍版本之学非一日矣。1979年图书馆学会成立，翌年江苏省图书馆学会于南京召开第二次年会及科学讨论会，瞿君撰《琴川书史》一文，于常熟刻抄书家、藏书家之资料，收罗宏富，足补地方艺文史料之不足。瞿君固常熟产，岂铁琴铜剑②之苗裔，渊源有自耶？

今年夏日，瞿君告余，于整编古籍书目工作余暇，汇编古籍刻工、刻书家的姓名一万余条，更见瞿君用力之勤，钻研之深也。

我国古籍版本之学，历史悠久，代有传人，然近二、三十年来，由于“左”倾之偏颇，加之十年动乱，究心

于是学者几稀，青黄不接，后继乏人，令人慨叹。然“十步之内，必有芳草”，于此兴衰绝续之际，得睹瞿君鼐勉三载之研究成果，余心感奋不能自己。若瞿君者，可谓脚踏实地之有心人矣。促膝倾谈，论及东邻日本研究汉学，于我国古籍版本之学，屡有专著问世，而国人反不如之，感慨甚深。乃知瞿君汇编是古籍刻工及刻、抄书家子目，非惟便于古籍版本研究之查考，更具振兴中华学术之宏旨也。于倾谈间，又发现瞿君于考订版本过程中的笔记，积数百条，瞿君虚怀，以管窥蠡测自况，不欲示人。余翻阅一过，谓此作不仅于版本之学多所发明，于各家著录之讹讹批谬，条分缕析，言必有据，足启治学之门径焉。因力劝其整理成篇，刊行发表。诚如瞿君自序中云：“版刻一道，岂有生而知之者！不从实际摸索前进，又何处得真知耶？”瞿君从实际中摸索，得此真知，有裨学术研究，岂能任其珠沉艺海乎？

余于古籍版本之学，所知甚微，忝居学会领导之职，繁荣学术研究，发现成果人才，固责无旁贷也。因缀数言，用以勉瞿君亦以自勉焉。

秀水许培基序于苏州市图书馆

1980年7月

注：

① 1982年改名“苏州大学”。

② “铁琴铜剑楼”，清季常熟著名藏书家瞿氏藏书室名，所收宋、元善本十余万卷，为当时全国四大藏书家之一

目 次

许序1

版本1

刻工43

年代63

行款81

歧异87

刊误108

其它129

跋140

《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》(1956年油印本)史部有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第二种著录为“宋宝祐五年赵与蘧湖州刻大字本”(《仪顾堂续跋》、《故宫善本书目》、《文禄堂访书记》暨所引宣统元年凤山跋均同此说)。按赵本半页十一行，行十九字，赵序“易为大书”者，与严州本相对而言也；今即称之“大字本”，嫌少切。至于“湖州刻”，余更有疑焉。夫赵氏于《宋史》本传称“居湖州”是矣，然何能确此书即为湖州刻耶？赵序刻于宝祐五年(《仪顾堂续跋》作六年，非)，序中始终未提到任何在湖州刻书之语气，仅称“淳祐壬子退而里居，四年之间熟得繙阅”，壬子为淳祐十二年(1252)，次年即宝祐，“四年”者，当是宝祐元年至四年(1253—1256)也；又称“精加校仇，以私钱重刻之”，夫阅读、校仇四年多，即使全部时间里居“湖州”，似亦不能即作为宝祐五年(1257)刻此书于湖州之确证。又王国维先生《两浙古刊本考》以此书属诸嘉兴府版，似系根据元延祐六年陈良弼序云

云，然陈序但称“其孙明安过嘉禾学宫，出所藏书板见示……以中统钞七十五定偿之，置之学宫，因书得板颠末于节斋序后”，是此板原为明安所藏，延祐间移置嘉禾学宫耳，所以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亦称“后延祐六年，节斋之孙明安，置之嘉禾学宫，递有修板”，更可知宝祐版非嘉兴所刻，不过板移嘉兴学宫后递有修改耳，故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即有“宝祐刻元延祐六年嘉禾学宫重修本”是也。然则宝祐原本究属何地所刻？考《宋史》、《苏州府志》、《吴县志》，赵与愿曾三任平江知府，第二次系宝祐三年到任，六年转知建康，则宝祐五年正知平江府期间，所谓“四年”者，实际上后二年已在苏州，则此书恐非湖州、非嘉兴而是苏州刻本也。不仅如此，府志称赵系“希恠子，寓处州之青田”，《青田县志》亦谓“希恠祖伯仁……寓居青田”，与愿弟与愿，开禧三年曾立为皇太子，原亦住青田县东百步新市巷，是知与愿原住青田，后移居湖州，嘉熙三年知平江，淳祐元年离任，宝祐三年再知平江，学宫弟子又为他建立生祠。景定元年七月三守平江，丐祠，旋即致仕，八月卒，《苏州府志·第它园林》中称赵于淳祐初辟千株园在销夏湾，作为种柑桔“读书处”；又清初人毛扆跋赵孟奎《分门纂类唐歌诗》谓“孟奎祖、父俱典吾郡（按赵希恠于嘉定三年四月知平江，五年正月改知太平，是年卒），有政绩，且丘墓在焉，寄贯于苏宜矣”，此皆赵氏有它第在苏州之佐证。则

“里居”者，谓湖州可，谓苏州更无不可。故余谓与 孙明安将藏板置之嘉禾学宫，属苏州移赠，似更信而有征焉。

《文禄堂访书记》于《王文公文集》一百卷下，注宋浙刻大字本，十行十七字，有刻工陈伸、孙右、施光、阮宗、余全、江清、陈通等。顷查得影印龙舒本，书名、行款、刻工无不吻合。方悟文禄堂所记者，乃安徽龙舒本，非浙刻也。

《书林清话》、《中国书史》于宋私家刻书中均援引钱大昕《竹汀先生日记抄》称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绍兴三十年刻印过《新唐书》二百二十五卷。所谓“绍兴三十年”者，盖以“卷末有墨记一方云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绍兴庚辰□月志”也。然此书后来未见记载过。查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有《唐书》一部，后归南京图书馆，即《江苏第一图书馆复校善本书目》史部所载此书第一种北宋嘉祐刊本，而北京图书馆《中国版刻图录》认为“纯系南宋初年建本风格”，乃“据北宋嘉祐监本翻版”是也。据所载，此书缺损甚多，余疑此有可能即钱氏所记之刘仲吉刻本，唯一标志之卷末牌记殆已阙佚耶？

《新唐书》二百二十五卷宋版，前人多定为北宋嘉祐刻本，以是书避讳至英宗止也。然北图《中国版刻图录》

疑之，列举三期刻工为证，认为南宋初期始刻，中期、元初修补，因此对此书属嘉祐本“恐不确”。余按百衲本中有新旧《唐书》两种，行款大体相仿，但刻体固有差别，《旧唐书》近欧体，勾磔之间有棱角，《新唐书》（除修补版外）字体方正浑厚，有平原笔法；且宋版避讳谨严，北宋后期诸帝，南宋刻书何能不避？故张元济先生亦同意《仪顾堂题跋》，认为嘉祐进书时所刻，较为可信，南宋、元初多次补刻，当是事实。故《中国版刻图录》既称此书属嘉祐本“恐不确”，又在图版一七八建本《唐书》下称“据北宋嘉祐监本”翻版，则固承认原本为“嘉祐本”也。所以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注此书版本时，亦只称宋刻本，而不称宋绍兴刻本，与宋版《外台秘要方》、《唐书》直指明“两浙东路茶盐司本”显然有别。盖“恐不确”者，实未能作为定论也。编者之校勘精当，立论审慎，有创见而不囿己见，亦可贵矣。

又《中国版刻图录》举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以证明此书为王永从刻本，余于此亦有疑焉。据《解题》原文，宇文时中取郡庠王氏刻本重刻，然此人于绍兴六年任吴兴郡守（见万历《湖州府志》），而王氏始刻《思溪藏》于绍兴二年，何时竣工未详，不过在此以前三种大藏：《开宝藏》刻了十二年，《崇宁万寿大藏》刻了三十二年，《毗卢大藏》刻了五十九年，王氏以私人力量刻此大部藏经，时间当亦不少。如果以二十年计，则此二书刻成，当在

绍兴二十二年（1152）左右，岂绍兴六年，即不仅已刻完五百四十八函五千四百八十卷之大藏，且又早已刻完用所刻藏经余版而续刻之《新唐书》、《五代史》等书耶？其次，既王氏刻此二书为利用刻藏经余版，然此二书总数在三百卷左右，岂区区“余”版所能胜任？由以上二点推测，王氏殆仅对二书漫漶处加以修补订正，非全刻也。

《涵芬楼烬余书录》于《陶渊明集》十卷条下，记称高宗时本，重刊刻工有洪明、胡端、施俊等。考胡端于绍兴间参加刻过《水经注》四十卷，洪明、施俊刻过明州本《文选注》六十卷，施俊又刻过《白氏六帖事类集》、《礼记正义》等，亦多属绍兴本。陶集既属高宗时本，列入重刊者何也？

《新纂门目五臣音注扬子法言》十卷，五臣者，晋李轨、唐柳宗元、宋宋咸、吴秘、司马光也。方品光《福建版本资料汇编》（1979年铅印本）称有“建阳宋咸刻本”，是必有误。使果宋咸注而刻之，其时何来吴秘、司马光五臣之名。考方氏所以误“宋咸刻本”者，殆以《仪顾堂续跋》（方氏误作《仪顾堂题跋》，亦非）卷九称：“前有宋咸序及……宋咸序后有木记云‘本宅今将监本四子纂图互注附入重言重意，精加校正，殆无谬误，誉作大字刊行，务令学者得以参考，互相发明，诚为益之大也。

建安□□□谨咨’六行，宋刊本……”，以为“宋咸序后有木记”，则木记云云，当即宋氏所刊，盖忽诸其后尚有“建安□□□谨咨”一条。夫□□□三字，当非宋咸二字；且此木记文字，纯系书坊家语气，断非都官郎中宋咸之刻书咨文，况所称“本宅今将监本四子纂图……”者，按年代次序，四子中当包括第三“子”宋咸，第四“子”吴秘，则此“本宅”，更非宋咸可知。

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卷四，有谭峭《化书》二种：一种称弘治十七年郑常清刻本，一种称弘治十七年刘达刻本，二者书名同，卷数、刻书年代亦同，颇异之。然《铁琴铜剑楼书目》称刘刻本，《天一阁书目》称郑刻本，似确非一种刻本。顷查得弘治甲子李绅序，称郑氏欲翻刻此书，谋于定州刘达，“慨然捐资，命工寿梓”云云，乃知两氏所刻，固一书也。主刻是郑，助刻是刘。谓二者合刻，比较符合实际；但作为两种刻本，则窃谓不妥。

《甬宋楼藏书志》卷九十八载《申斋刘先生文集》十五卷，题门人萧洵德瑜校正，番阳费震振远编次，李序云萧欲以此书“刻诸梓而无其财，于是吉水郡侯番阳费君振远慨然领之”，萧跋亦云：“荷州之贤侯费君振远梓成”，是编校主刻者为萧洵，而捐资助刻者则费震也。情况与上谭峭《化书》正同。邵懿辰、邵章《增订四库简明目

录标注》称此书为元萧洵刻本，似嫌少切。

云庄书堂为元代建阳刘姓书坊，据《建阳县志》卷二，是宋代刘燠（学者称云庄先生）之故居，嘉定间于其地建书院，勅赐今名。《书林清话》作云庄书堂。根据森立之《经籍访古志》载，曾刻印过宋祝穆、元富大用《事文类聚》，但未著录年代。《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》甲编（1956年本）则记载为元泰定三年庐陵武溪书院、建安云庄书院刘氏刻本，当属可信。但《福建版本资料汇编》将该书坊列入明代，不知所据？惟所刻书同，所引又即《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》本，殊属费解。

《乐府诗集》有宋版，有元版，宋版十三行二十三字，元版十一行二十字。日人长泽规矩也于《宋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》中将元版刻工施惠、吴五、王林、张振、舒关里（舒关）尽列入宋版表中，于书名下注明“系静嘉堂藏本，宋刊元修本（元刻较多）”字样。考静嘉堂所藏书，系陆心源皕宋楼藏本，《皕宋志》、《仪顾跋》中《乐府诗集》只有元版，无宋版，不知长泽氏所称“宋刊元修”之何所据也。

元后至元刻本《本草元命苞》九卷，《邵目标注》著录为元史从善撰；《读书敏求记》则称“尚仲善集此书”。

史、尚二氏，一而二，二而一耶？然皆无考。按，《读书敏求记》另于吴恕《伤寒活人指掌图》条下注“至元间贾度、尚从善为之序而刊行之”。看来，史从善殆“尚从善”一字之误，尚仲善或亦系“尚从善”一音之讹也。当进一步考求之。

元张伯淳《养蒙集》十卷，元刻本殊少见。《邵目标注》卷十七载“元至正六年刊于家塾”，《续录》又载“元至顺三年子张采刊本”。按此二条看来系根据张氏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所录序跋而来。考至顺三年虞集序称：“今其子采辑其文而传之，……故为序其端云”，又至正六年张采跋“命男炯访求遗逸，厘为十卷，刊之家塾……”。粗看之似属两个版本，实则仅一至正版耳。原因是：（1）至顺序仅言“辑其文而传之”，是尚在访遗辑佚之中，未及刊行，先请名流学者作序，殊有可能；（2）至正序始称“刊之家塾”，则正式刊行问世矣。如果至顺三年张采已经刊行是书，何以仅隔十四年后（至正六年）张采跋中始终未提重刊、校补字样，于此知《邵目标注·续录》所谓“至顺三年子张采刊本”者非也。其著录应将两条合而为一，作“元至正六年子张采刊于家塾，至顺三年虞集序”，庶乎近之。

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卷四《书史会要》洪武九年

版，注“卢祥、林应麟等刻本”。查此书共九卷补遗一卷，除第八卷及补遗外，每卷首尾均有助赏刻印人名，卢、林二人乃第三卷后所署之助刻者（按第三卷助刻人首列卢祥，次景雱，次林应麟，次……）。余谓如以助刻者为准，则著录按惯例应属首卷张珪（瑞卿）及卷二张麒（国祥），作“张珪、张麒等刻本”，似不应以第三卷为准。然查曹睿序“君将以此书餽诸梓，以惠后学”，则此书刻印者恐当属陶九成本人为妥。

吴则虞《版本通论》于明藩府所刻书下，著录肃府、蜀府均有刻印元刘因《静修集》三十卷，且同是成化十五年刻。惟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、《邵目标注》均只载“成化己亥蜀府再刻”，未见有“肃府”本。可能沿陆氏《甬宋志》、陈彬龢《中国书史》之误。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虽两者并举，然亦疑陆氏所记为不确，是也。

无锡秦氏为望族，代有闻人，如秦梁、秦旭、秦汴、秦镗、秦松龄、秦瀛、秦炳文、秦蕙田、秦绶业等。《邵目标注》于《隶释》条下注无锡秦氏玄览中枢抄本。误矣。玄览中枢为明万历间秦四麟（酉岩）之室名，秦系常熟人，非无锡也。

游明字大昇，明正统间丰城人，天顺间刻印过《史

记集解索隐》一百三十卷，成化间刻印过《批点分格类意句解论学绳尺》十卷等多种。但《邵目标注》于《史记》条下，认为“元刊《宋史》全文内，列丰城游明大昇校正”字样，乃称游为元末明初人。然中间相距约一世纪，未可信也。余疑游所参校者，当是明成化朱英本，非“元刊”也。考《仪顾堂题跋》曾误以朱英本作至正元刊本，张元济先生已辟其谬，邵目之误，亦蹈陆氏之复辙也。

王鏊，明正德间吴县人，字济之。抄本宋孙覿《南兰陵孙尚书大全文集》七十卷，有“济之”印记。顺治九年，叶树廉题为“王文恪公抄藏本”，未免臆断。夫“济之”二字，岂无同名而必其为王鏊耶？且仅有藏章，亦何能必其为本人所抄？钱大昕疑之，故仅称此书为“王文恪公家藏本”，张金吾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称此书为“明初抄本，王文恪公藏书”，盖均肯定为王氏所藏，而非王氏抄本也，较为可信。

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集部总集类有《唐三家集》九卷，明姜道生刻本，《中国丛书综录》因之，作集部丛书之一。然北京大学图书馆《李氏书目》有姜道生刻本唐李贺《唐太常寺奉礼郎李长吉诗集》一卷，唐温庭筠《唐方城令温飞卿集》一卷两种，其书名前均冠以作者职衔，

与《唐三家集》所载形式略同，是姜氏所刻固不止“三家”，当不得以《唐三家集》名之。

影印《磻砂藏·宗镜录》一百卷末印有“正统七年九月，陕西西安府咸宁县南景里……王羲、王礼，侄男王真……施财印造大藏等经一全藏，计六千三百五十卷”字样，说明这部大藏经是王姓于正统间用原版加印的，也就是蒋维乔等于1935年借以影印之母本，顾影印版在若干序跋中未一道及此宋元版明印本，何也？

莫伯骥《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》集部《青阳文集》六卷附录二卷条，称正统高诚刻本，半页十一行，行十九字，卷二末有“农民严时茂写”六字。余查《四部丛刊续编》影印本，其行款卷数均不相符，卷二亦无“严时茂写”字样，心窃疑之。考《邵目标注》于集部《青阳集》条下，谓高诚（刻作张诚，误）本九卷，与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所载皆同，是高刻本乃九卷，即影印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本之母本，本无附录，张元济先生后跋亦已论之详矣，行款则正如邵注“十二行二十二字”也。至六卷本附录二卷，则正邵目所指正德胡汝登刊本，其行款亦与之相符，是莫氏误正德本为正统本也。

《复旦大学图书馆善本目录》著录明成化二十年朱氏